

澳門學術發展與價值共同體的形成

吳志良

〔提 要〕 “一國兩制”是中國智慧對人類文明的貢獻和政治文明的偉大創舉,其實踐是前所未有的偉大事業,需要在港澳兩個特區不斷探索中逐步完善和豐富。港澳兩個地區的歷史演變不同步,回歸之後發展的態勢也存在差異。澳門之所以能夠相對平穩,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能夠在政治轉折和制度變遷的過程中牢牢把握歷史話語權,致力構建新的宏觀歷史敘事,凝聚社會共識,增強居民歸屬感和家國情懷,建立新的價值共同體。從學術史的角度,縱觀澳門的社會思潮和學術動態,探討澳門學術發展與價值共同體形成的共生關係,澳門學術界有正確的價值導向和強烈的現實關懷,對核心共同價值的構建產生了積極而重要的影響,特別是伴隨澳門社會進步而構建起來的澳門學,對探討澳門的發展理論、制度和道路建樹良多。

〔關鍵詞〕 澳門 學術研究 學術發展 澳門學 “一國兩制” 共同體價值

〔中圖分類號〕 D676.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4) 04 - 0026 - 14

澳門回歸祖國 25 年來,整體上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和諧穩定,在實踐“一國兩制”上取得了喜人的成就,舉世矚目。在諸多促成澳門特色“一國兩制”成功的因素中,有一點至關重要,那就是澳門特區成立前後新的價值共同體的逐步形成。而在此一過程中,澳門學術發展又起了重要的積極作用。

我們一直認為,澳門學術一向帶有強烈的現實主義關懷和實用主義導向。澳門當代學術是伴隨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形成發展起來的,1999 年的巨大政治變遷是其轉折點。與此同時,澳門學術進步又成為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助推器,特別是學術討論的社會化為澳門回歸做了很好的思想準備,為特區成立後新政治共同體主流核心價值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促進作用。本文試圖簡略回顧澳門回歸前後 25 年的社會思潮、學術動態,初步探討澳門學術發展與價值共同體形成的共生關係,以期拋磚引玉,引起學界的關注和深入研究。

一、回歸前夕的焦慮與期待

澳門歷史發展進程獨特,歷史研究也以中葡兩國對澳門主權之爭為發端,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從澳門本土視角看,華洋長期共處分治的狀態,很難形成價值共同體,歸屬感、自豪感也不一致。1974 年,葡萄牙“康乃馨革命”為該國政局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由此建立的第三共和以非殖

民化作為取得其正當性的來源，同時承認澳門為中國領土，為中國政府在將來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創造了有利條件。1979年，中葡兩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澳門政治法律地位也逐漸明朗。1986年6月30日，雙方正式展開關於澳門前途問題的談判，並於1987年4月13日簽署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確定中國政府將於1999年12月20日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1988年1月15日，澳門進入政權交接的過渡期，從此揭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篇章。

1. 歷史的必然

1978年，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港澳回歸、祖國統一成為了歷史的必然。港澳順利回歸，也是改革開放的重大成果。港澳回歸前，相關與內地聯繫的討論大多集中在珠江三角洲經濟協同發展層面。1983年7月，廣東省政府展開建立珠江三角洲經濟區的調查規劃工作，作為帶動全省經濟發展的引擎，首次將港澳納入考慮，包括三個層面：第一層是珠江三角洲各市縣；第二層是珠江流域廣大地區，包括廣西、湖南、湖北、雲南、貴州、江西、福建等省的部分地區；第三層，從長遠看，還應把香港、澳門包括在內，組成具有國內和國際經濟中心功能的特殊形式的經濟區。^①

1984年11月8日，澳葡政府經濟協調政務司高樹培（João António Morais da Costa Pinto）在一場關於澳門經濟發展的專題演講中對此作出呼應，提出“澳門未來的經濟是與中國整個南方的發展有關的”。^②1985年，有前往珠海考察的北京大學學者也認為珠海將“與澳門經濟上逐漸連為一體（我以為，經濟一體化是政治一體化必要前提這一趨勢，無論如何總是不可避免的）”。^③

1986年，時任中山大學港澳研究所副所長雷強提出，要在港澳的資本主義制度及深珠社會主義制度之間協調出一個可以開始大規模合作的途徑。例如珠海單獨建深水港及機場就難以發揮經濟效益，所以無論是珠海或澳門，單獨去建機場及深水港都不會理想。^④同年12月，新就職的澳門總督馬俊賢（Joaquim Pinto Machado）在接受採訪中也提到，港澳兩地還應增加一個夥伴就是廣州。穗、港、澳在珠江三角洲形成一個三角，這三個城市有許多相似之處，亦各有所長，可以互為補充，相輔相成。^⑤

1988年11月，合和集團董事總經理胡應湘提出興建港澳跨海大橋。1993年2月，珠海市提出興建連接珠海和香港屯門的伶仃洋大橋。可惜，兩個旨在促進粵港澳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方案都不獲港英當局認可。

1989年3月，有讀者在澳門《華僑報》撰文，認為“省港澳”經濟一體化，在將來成立特別行政區後，沒有歐洲那樣複雜的藩籬和障礙，卻有着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差別。設想今後所謂“省港澳”經濟一體化，應是以穗港澳三點及珠江三角洲這樣一個大致的經濟地理範圍及其附廓形成一個開放經濟協作區，穗港澳各自發揮優勢並以鄰之長補己之短，相輔相成；在廣州與珠江三角洲的支持下，充分發揮港澳兩座南大門對祖國經濟建設與國際貿易往來的作用。這種協作是在兩種制度的交叉前站地帶的協作，是彼此有選擇地“投其所好”而着眼於國際市場競爭和有利祖國建設的協作，是“一國兩制”下的協作。澳門目前還是這個設想中較弱的一環，但是澳門具有和香港相似的特殊優勢可供利用和發揮，前途無量，可以借鑒穗港之長，迎頭趕上。^⑥

今天回顧，雖然意見不盡相同，但當時不乏對港澳未來發展和粵港澳合作大膽之設想，而且這些設想如今都漸漸實現，令人欣佩。更重要的是，當時已有有識之士認為港澳回歸實屬歷史必然：如今港澳正是面臨着一種歷史力量的震撼。這是整個中國的歷史、文化和民族性的因素在他們背後發生作用，亦同中國正處於一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世界有關。^⑦

2. 焦慮與期待

當然，未來總是不確定的。過渡時期的澳門焦慮和期待並存，但更多的是期待。焦慮主要是當時有部分的澳門居民仍對國家沒有足夠的了解，甚至不很信任中國政府對“一國兩制”的承諾，尤其是在過渡時期之初一些地方所出現的負面影響；其次是“中文合法化和公務員本地化是政權交接的最重要條件，但這‘兩化’在目前幾乎‘十劃未有一撇’，要在短短的十多年內完成，實成疑問”，有部分葡籍或葡籍土生人士，準備在某一時間離澳他往，他們不少已在葡國購買房屋，準備後路。甚至也有中國商人，結束澳門業務，舉家前往葡國定居的；有一些人“嘴巴上對澳門前途一味叫好，並大聲疾呼要關心澳門，建設澳門，而他們的一隻腳卻早已踏在離澳而去的船上，另一隻腳之所以仍未上船，乃因為澳門還有一些油水可撈。”^⑧

期待者則有更充分的理由，認為澳門問題比香港簡單，況且葡萄牙早已承認中國對澳門擁有主權，因此對澳門前途應具有信心。另一方面，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等原則下達成香港問題的圓滿解決，對澳門也起了一個很好的示範作用。澳門市民經常進入珠海特區，都眼見它那種日新月異、欣欣向榮的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嶄新面貌，不禁讚歎，甚至對澳門發展的緩慢節奏，產生反感。很可能，澳門“五十年不變”後，珠海的“現代化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將不但趕上澳門，甚至會超過，這是可以預期的。”^⑨

對澳門前途具有信心的另一個表現是，澳門前途問題被提上議事日程後，市民的政治參與開始升溫。在短短的一年內許多團體相繼出現，是澳門政治地位面臨歷史性演變前夜的產物，是澳門各種政治力量為應付這一演變的新調整及新部署。各團體所傳遞出的多少公開化的政治訊息，似乎是对過去澳門政治那種較為隱蔽的狀況的一種改變，相信這對澳門的繁榮進步有好處，它讓人們對澳門的政治事務有更多更直接的了解，並鼓勵更多的參與，從而或多或少地打破澳門社會的某種沉悶格局，注入更多的生氣與活力，為澳門人適應未來的轉變創造有利的條件。

面對此一歷史轉變，社會有諸多討論，學術界也主動承擔起歷史使命。時任東亞大學校長林達光強調要解放思想，拓寬視野，加強學術研究。“對於澳門社會的研究，應是綜合性的，客觀的，要從理論方面出發，找出發展規律，從整體着眼來研究，因為發展是一個系統、有機的歷史過程。我們的視野應該更加開放，從澳門所在的整個區域着眼。……我們需要探討澳門與珠海、深圳、廣州、香港、珠江三角洲、太平洋地區及整個東南亞在文化、經濟和科技等方面的關係，以及影響。我們的工作很有意義，責任也很重大。”^⑩

3. 澳門學應運而生

在這關鍵而敏感時刻，學術界登台發聲，“澳門學”也橫空出世，引領着澳門研究和社會討論的方向。1989年2月25日，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舉辦“關於建立‘澳門學’問題研討會”，熱烈討論建立“澳門學”的必要性與可行性、研究對象與方法，以及如何建立“澳門學”等問題。對於“澳門學”的定義，與會者有不同的看法，但不無預見性且充滿了現實關懷：

其一、“澳門學”是以澳門社會為研究對象，既從縱切面研究澳門社會的發展過程，亦從橫切面研究社會的各個方面，從而發現和闡明澳門社會及其發展規律的特殊性。因此，“澳門學”是一門關於澳門社會及其發展的科學。其二、“澳門學”不是僅冠上“澳門”兩字的鬆散學科聯合體，而是各學科融會貫通的綜合區域學科。因此，“澳門學”具有多學科性，是綜合研究澳門問題的地區性學科。其三、“澳門學”的研究對象不應該是包羅萬象的，也不應是鑽“故紙堆”的，而應該是澳門現在和未來的主要問題。^⑪

黃漢強的觀點既有學術關切，又有家國情懷。他認為“澳門學”作為一個“地區學”，其研究對

象是澳門社會。“澳門學”從發展的流程來剖析澳門的縱切面,即研究澳門社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尋找和闡明其發展的規律性;從社會各領域來剖析它的橫切面,即分門別類地研究澳門的經濟、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社會以及同外界關係等各方面的架構、特點及其規律性。通過縱向和橫向的研究,“澳門學”成為一門反映和闡明澳門社會及社會各領域的矛盾、規律及其相互關係的學問。“無論是認識中國對外開放史、東西方貿易史、中西文化交流史,抑或了解一個中小城市參加國際市場而促進自身發展的規律性,澳門都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尤其是今天,一方面我國處於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時代,另一方面澳門又處於回歸祖國的過渡期,如何利用澳門因地制宜參加國際市場的經驗來推動內地中小城市的發展?如何利用澳門作為國際自由港的地位和擁有的優勢來促進內地的改革與開放?如何維持澳門社會的長期安定和繁榮而使其到 1999 年順利過渡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如何使澳門在 1999 年以後的 50 年內,在‘一國兩制’下實行澳人高度自治,維持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不變而繼續發展和發揮作用?諸如此類的重大課題,都有待於對澳門社會特殊規律的認識和利用。”^⑫

魏美昌則強調澳門社會實踐經驗和文化交融狀態。他認為,由於長期以來缺乏研究,至今未有人能夠系統地和明確地闡述澳門歷史上這種多元文化和多元制度相處與交融的寶貴經驗以及因而形成的澳門特色。人們只是滿足於一般的抽象或含糊的認識,不了解自己特點就談不上去維護它或發展它,澳門就很難繼續起它應有的特殊橋樑作用。“澳門的經驗,如果總結得好,將為此提供寶貴的借鏡。澳門地方小,比較容易解剖,從中可看出兩種文化互相排斥和衝突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分析其長期共存、互相融合的一面,即‘化學的結合’。這就要求我們分析每個元素的性質和特徵以及‘結合’後所產生的社會效果。”^⑬

楊允中指出澳門與祖國血肉相連的關係,但同時肯定葡萄牙文化對澳門的影響:“澳門的中華文化同整個大陸中國的傳統中華民族文化連成一體,是背靠關係,而澳門的葡萄牙文化同其母體文化遠離半個地球,是背離關係。前者屬借入式,後者屬傳出式。兩者作用力、影響力不同,後者所以能立足,主要是藉助行政手段。由於澳門是東西方文化方面在遠東的最早主要接觸點之一,兩種文化的精華部分分別向外擴散,使澳門近幾個世紀在溝通東西方文化過程中扮演了不容置疑的歷史性作用。”^⑭因此,要實事求是地對澳門歷史和現狀進行考察、研究、論證,並提高學術性、系統性、權威性。

陳樹榮以澳門處於珠江與海洋交匯的地理特徵,形象地提出了“鹹淡水文化”的概念,認為它是幾百年來中西文化互動交流而逐步形成的結果;澳門鹹淡水文化,雖是兩種文化為主或多種文化交匯一起,雖是社會人文狀況的表現而非自然現象,但亦隨着各自力量、力度以及時局變化而因勢利導,往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遇、接觸,有衝突、有交流、有溝通,形成各種形態,或各自獨處,或和平共處,或交融相處,具有開放、包容、互動,多樣、滲透、獨立、重商和複雜等表面上互為矛盾,實際上是交互並存的特徵。^⑮

黃漢強、魏美昌、楊允中、陳樹榮這幾位“澳門學”的倡導者也是澳門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對澳門過渡期的敏銳觀察,頗具代表性,既體現了其深厚的民族觀念和國家意識,也反映了當時澳門社會對未來的期許,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澳門在回歸後如何保持本身的獨特性又能貢獻國家改革開放的主調,對形塑澳門的主流價值認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澳門基本法起草和諮詢過程對形成價值共同體的重要作用。由 90 名澳門各界人士組成的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共安排了 168 次諮詢會議及 192 次工作會議,先後共 90 次到數十

間學校、社團機構收集對基本法的意見，並廣泛徵詢各階層、各界別的意見，然後把這些意見反映給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讓他們更多、更好地了解澳門的實際情況。這樣，起草基本法的過程便成為動員和吸收市民參與，集中市民意見的過程，也是市民自我進行公民教育的過程，既達到起草基本法的目的，同時也提高市民的公民意識，在更高層次上完成起草基本法的任務。在此一過程中，澳門越來越多的學校、社團組織市民前往內地參觀訪問，進一步增加了對民族文化和國家發展的認知，增強了家國情懷。

二、特區創建期的探索與話語權的回歸

1999年12月20日零時，五星紅旗在澳門冉冉升起。中國人民解放軍從關閘進駐澳門途中，澳門居民舉起了紅色的巨大橫幅：“我們回家了”！這是歡呼，也是最真實最樸素的內心表達。雖然澳門回歸前幾年經濟低迷、治安不靖，特區建設百廢待興，但全澳居民精神振奮、信心十足、團結一致，對特區的誕生充滿了期盼和希望。

1. 低起點與新高度

自1996年起直至1999年，澳門本地生產總值連續四年錄得負增長，1999年的環比生產總值倒退至1993年的水平。總體失業率在2000年達到6.8%的歷史紀錄。澳葡方面將28億澳門元的歷年現金滾存列入1999年財政年度預算，又不接受中方提出對動用滾存應事先與其磋商的要求，只留下24億澳門元的債權留予特區政府的“滾存”，致使澳門特區成立時，只能依靠1999年的財政收入，再加上3億澳門元的盈餘和大約102億澳門元土地基金的孳息維持基本的日常公共開支。^⑥如此可見，特區創建初期經濟家底起點之低。

在這種情況下，“澳人治澳”政府從文化傳統尋找精神力量，高舉愛國主義旗幟，號召全體居民同心同德，同舟共濟，共克難關。首任行政長官何厚鏞“中國心、澳門情”的競選綱領，充分體現了澳門居民真切的家國情懷，也成為了創建澳門特區的主旋律。澳門回歸祖國“只是葡萄牙管治時代的結束，它絕不意味着澳門發展的終止，而是標誌着站在新起點進入更高層次的啟步。”^⑦何厚鏞在宣讀特區首份《施政報告》時明確宣示，“‘愛國愛澳’是澳門社會的一個優良的傳統，此傳統在澳門回歸後進一步昇華為擁護‘一國兩制’，積極建設澳門的主流力量。”^⑧

特區政府蜜月期過後，面對執政第一年的困難與挑戰，行政長官再次強調澳門的共同價值：“我們相信廣大市民一定能夠發揚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保持頭腦清醒，明辨是非對錯。我們必須團結一致，絕不容許一切損害廣大市民利益及社會穩定發展的行為，同心同德地把我們的家園建設得更加美好。”^⑨以“愛國愛澳”為核心價值，融入特區政府的施政理念，並以此為旗幟，引領澳門居民凝心聚力搞建設，促進澳門社會從殖民管治到當家作主的歷史性制度轉變，成為了特區發展的主旋律和總基調，也將價值共同體建設提到了一個新高度。

為了落實此一理念，必須更新思維，改變觀念。政府首先從公務員培訓着手。“過去一年，澳門公務人員的培訓事業揭開新的一頁，配合特區公務人員新時代使命的一系列訓練課程開始全面啟動。有關課程的授課對象，涵蓋了全體公務人員，協助他們建立整體一致的角色觀念和工作文化。我們授以特區政治法律體制的基本概念，使學員對‘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有進一步認知，同時，使他們明瞭本身的工作在政府整個施政理念中的位置和意義，促進政府的核心施政方向貫徹到每一個運作細胞之中。”^⑩

舉什麼旗，走什麼路，是根本性的政治方向和思想認識問題，需要從教育抓起、以制度規範。

2006年,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非高等教育制度綱要法》草案,提出澳門非高等教育的總目標是“致力培養及促進受教育者愛國愛澳、厚德盡善、遵紀守法的品格,使其有理想、有文化及具備適應時代需求的知識和技能,並養成其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強健體魄”,獲得負責細則性審議的第一常設委員會全體委員的認同:“委員會認為法案的規定既維持了現行法律確立的核心價值,又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作出了必要的調整,因而是適宜的。”^②有關條文在全體會議上亦獲全票通過,從而奠定了構建價值共同體的法律基礎。

確立政治導向,夯實法律基礎,做好思想引領,推動觀念改變,從正規教育和公務員培訓入手,以實際行動促進了特區價值共同體的形成,正如澳門中華教育會理事長劉羨冰所言:“愛國,貴在行動。澳門人的愛國傳統貴在認識和行為的一致性。”^③

2. 跳躍發展與激盪年代

澳門回歸初期是艱難的,經濟基礎弱、財政條件差,幸得中央關懷、祖國人民支持、居民守望相助、政府勵精圖治才共克難關,步入發展正軌。在學術界建議和社會各界的強烈呼籲下,在電訊業開放的經驗之上,政府決定結束博彩業的壟斷經營而適度開放。這是澳門傳統經濟經營模式和制度的重大創新突破,也帶來了澳門經濟的第二次騰飛。

博彩業開放後,學術界再次為此一政策辯護:“澳門特區的最優經濟發展策略,應當是鞏固及完善博彩旅遊業,使它能繼續為澳門特區貢獻產值及創造就業機會。一個可行的構思是在十年內,集中資源將澳門特區發展成為一個以博彩帶動,配合家庭度假設施的綜合旅遊商務、會議娛樂中心。這個方案在澳門特區現有的經濟結構下應是風險最低的選擇。”^④“隨着博彩業開放,訪澳旅客增加,留澳時間延長,博彩業金額上升,將會是澳門旅遊博彩業未來的發展趨勢。”^⑤

當然,學術界對此並非沒有遠憂,認為製造業、建築業等經濟產業在澳門整體經濟中仍然擔當主力,同時應該發展科技產業及其他新興產業。到了科技產業及新興產業形成之後,澳門經濟結構更趨向多元化,經濟基礎更加穩固,穩健發展有了保障,實現長治久安的目標。“旅遊博彩業要在酒店業、飲食業、文化娛樂業、交通運輸業、金融業等的配合下才能發揮出‘龍頭經濟’的強勢,這是事物的規律。多一個產業,多一個發展空間,多一層保障。實行一業為主、多種產業並存的策略,是澳門經濟穩健發展的基礎。”^⑥

2002年博彩業的適度開放和2003年中央支持港澳的“自由行”政策,快速帶動了澳門的經濟繁榮。澳門本地生產總值從1999年的523億增長到2019年的4,455億,政府財政因此水漲船高,免費義務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民生事業也得到了明顯的改善,澳門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與此同時,經濟的高速發展也衍生了新的社會問題,物價飆升、收入與分配產生矛盾、貪腐出現、交通困擾,公平、公正等議題也成為新一代的重點關注。從2000年開始的“五一遊行”的訴求也從削減輸入勞工、保障本地工人就業擴大到2007年的反貪腐、保民生、削外勞、除黑工、安居樂業、家庭團聚等;2013年,更發展到推動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雙普選”;2014年5月27日,因抗議《候任、現任及離任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的保障制度》法案而發生的立法會事件,將社會運動推上了高潮。直至2018年,各類遊行還時有發生。

面對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澳門學術界集體發聲,是其是,非其非,並且提出很多政策建議。

楊允中認為,2007年澳門的“五·一遊行”具有以下幾個特點:訴求擴大化(外勞與就業、高樓價、交通緊張、官腐問題,等等);行為政治化;外力干預表面化;結構複雜化(善後難度大)等。事件對澳門社會有多重啟示與教訓:澳門加速發展引發社會矛盾激化,但勿需過慮;政府依法施政、民本

政府建設,尚存諸多薄弱環節;歷史遺留問題消化過程過長,成為少數人口實(如輸入外勞與人力資源短缺,過去人口政策);2006年政府處理遊行方法過軟,導致個別人心存僥倖;基本法23條立法未及時完成造成被動;外界勢力干預澳門特區在加劇;澳門社會生態正發生裂變,中央政府、特區政府面對新難題;社會理性發展、民主法治道路,依然漫長。事件說明博彩業和整體經濟快速增長伴隨的是社會成本急劇增大。

駱偉建認為,政府以競爭來促進市場效率,卻顯得準備不足,建議政府應有所為、有所不為,並把控發展節奏,重視公平公正:“澳門出現了歐文龍事件,廉政出現問題,這容易在市民心目中強化‘只會利益輸送的政府形象’,公平公正若處理不當容易引起民怨。”婁勝華則建議政府與時俱進,調整功能:“政府在剛回歸時,主要是運用政府的發動功能來發展澳門經濟,當經濟搞起來,便要啟動政府的第二種功能,就是減壓功能。”政府減壓功能“啟動得有些慢,跟不上時代發展。”^②

學術界對澳門歷史上所出現的民情民意並沒有停止反思:原因可能在於:一是對制度建設意義、價值與規律的認知存在明顯的提升空間;二是對當前民情民意的預判失據失位。其實,“澳人治澳”的民本政府施政取向始終要在官與民、得與失、重與輕、先與後等對立統一關係中作好平衡,力求不違民意、不損民利、不缺民智。^③

民情民意受到澳門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從過往政治實踐看,澳門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或多或少地受到周邊尤其是港台地區的影響。^④“滿腔熱情的青少年透過網絡片面的訊息,紛紛效法,導致愛國愛澳思想慢慢下降,今天加強青少年的愛國愛澳教育已成為關注的議題。”^⑤

這是經濟結構變化導致社會關係不適應的明顯表現,社會矛盾激化似乎不可避免,青年學生的公民意識也與日俱增。值得指出的是,在此激盪年代,學術界沒有缺位,更沒有失語,愛國愛澳的總基調也沒有發生根本性的動搖,社會整體保持和諧穩定,主流核心價值經過洗禮還得以進一步鞏固,共同體建設得以進一步強化。但不能否認的是,經濟社會結構的轉型衝擊了原有的社會生態、社會運作和價值形成模式,其影響尚有待評估。值得深思的是,新一代有新一代的訴求,需要傾聽、討論和接納,共同價值需要發展完善。

2020年開始的新冠疫情以及博彩業的調整,增長的煩惱突然演變為衰退的擔憂。我們突然發現,原來的許多問題變成了偽問題,原來不是問題的現在成為了大問題。疫情結束後,整體經濟和政府財政恢復了八成,但市民卻面對店舖倒閉、就業機會減少、薪資停滯等問題,新的產業尚未形成,舊的行業不斷萎縮。雖然這是全球普遍存在的問題,但這種現象過往未曾出現過,值得我們高度警醒。^⑥信心不足、居民向心力和凝聚力減退、社會資本的流失,必然會動搖社會的政治基礎並影響價值共同體的發展鞏固,這可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

3. 話語權的回歸

任何社會發展都有起有伏,不會一帆風順。澳門回歸後沒有發生香港那樣大規模的失序和動亂,更沒有像其他從殖民地獨立出來的國家和地區那樣長期動盪不安,其根本原因是在《基本法》框架下建立新的政治共同體後,能夠排除雜音和阻力,統一思想認識,迅速構建主流核心價值。而主流核心價值的形成,需要本土知識體系的構建,需要話語權的回歸。

話語權的回歸是從宏觀歷史敘事開始的。“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往哪裡去”,是任何重大政治轉折、解決迷思面臨的關鍵核心問題。心安才能身安,身安促進心安。但要釐清這個問題並使大眾理解接納,需要學術界的全面介入和深入系統研究,總結本民族、國家、地區的歷史演變和社會發展規律,把準方向,構建本土知識體系,不斷生產和向大眾傳播思想,凝聚民心民意,促成群策群力

的良好態勢。“在現代社會,學術研究對總結社會發展規律,推動並引導社會朝着協調‘健康’方向發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③也只有這樣,居民的思想價值觀念才不至於迷惑混亂,變化中的社會秩序才能走向正軌並保持正常穩定,大家才能全心全意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使政府和社會走向善治,人民過上好日子。

澳門話語權的回歸也是從構建澳門歷史的宏觀敘事開始的。早在上世紀 90 年代,澳門史學界已就此展開了系統深入的研究,中葡史學界也不無爭論、交鋒。但是,經過回歸前後近 30 年從檔案文獻史料全面挖掘整理着手的相關研究,澳門歷史原貌得以大致恢復,從本土視角出發、在中國歷史大背景的澳門歷史宏觀敘事逐步得以確立。2013 年,我們首次提出了這個問題: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又以歷史研究為例,澳門在回歸後實現了話語權的回歸,並體現在:研究人員主體的本地化、研究課題和研究成果的本地化、聚焦澳門內部社會變遷研究、擴寬了澳門歷史研究的視野,以及跨學科研究使研究方法不斷進步。^④

2019 年澳門回歸祖國 20 週年之際,我們再次指出:澳門學術界不辱使命,不負重託,秉承愛國愛澳的優良傳統,抓住千載難逢的機會,以極大的熱情和強烈的現實關懷,投身於這個風雲變幻的時代,投入到澳門歷史文化、政治社會和“一國兩制”理論和實踐的研究和探索中。從歷史檔案的挖掘整理到文化現象的深入研究,從政治形態的趨勢探討到社會實踐的經驗總結,孜孜以求,默默耕耘,探求澳門歷史發展規律,了解澳門文化深厚底蘊,認識澳門社會特性,分析澳門經濟發展模式,剖解澳門政治運作方式,闡釋澳門與國家、澳門與世界的關係。20 年後,我們發現,我們對這個城市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認識,對這塊土地有了更加深厚的感情和眷戀,對澳門的歷史價值和特別行政區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意義有了更加客觀的評估,對中華文化和國家發展有了更多的自豪感,對世界有了更加清晰的視野。

這是澳門學術界的最大貢獻。在學術活動即在積累、生產和傳播知識的過程中,增加了居民對澳門的歸屬感,增強了居民對國家的認同感,增進了居民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正確理解及其對“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信心。事實上,在學術界的共同努力下,澳門本土知識體系初步成形,歷史話語權悄然回歸,家國情懷不斷加強,這對凝聚社會共識、形成社會主流意識至關重要,對樹立“一國兩制”的正確價值觀、對建立“一國兩制”實踐的主體性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切,奠定了澳門實踐“一國兩制”的思想基礎和社會環境,令澳門特別行政區開局良好、發展順利。今天,我們比任何時候都對澳門的價值和潛力有更清晰的認識和把握,對中華優秀文化傳統和祖國驚人的發展進步有更深入的認知和體驗,對特區的未來和民族的振興更有信心、更具決心。^⑤

現在看來,歷史話語權的回歸,也是文化話語權和政治話語權的回歸,是價值座標的確立,其意義不僅僅停留在學術層面,對共同價值的形成和鞏固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話語權的回歸,是回歸前後多年學術積累、知識增量和社會各界共同討論形成共識而自然達至的結果;話語權的把握,也使得澳門在跨越式發展和激盪起伏時期能夠抵受重大衝擊而保持社會整體不亂方寸、安定穩健的重要因素。縱然形有波動,但勢仍向好,主流共同核心價值依然發揮着超級穩定器的功能。正如習近平主席指出的,“如果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就會魂無定所、行無依歸”。^⑥

三、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建設國際大都市

中國改革開放 40 多年,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取得了歷史性成

就。這深刻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也深刻影響了世界的格局。中國和世界形勢翻天覆地的變化,形成了當今世界百年未見之大變局。這一切,無可避免地折射到港澳兩個特區,既推動港澳的巨大發展,也為其帶來極大的挑戰,港澳回歸後發生的波動起伏難以避免。在新形勢下,港澳必須審時度勢,與時俱進,順勢而為,主動納入國家治理體制,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充分利用“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地位優勢和“一國兩制”的政策優勢,在國家發展戰略中扮演一個更加主動、積極的角色,乘搭國家發展快車,共享祖國發展和民族復興的榮光。

1. 發展的困境和出路

澳門回歸祖國後,創造了經濟史上的發展奇跡,也經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經濟繁榮背後,各種深層矛盾加速暴露和激化。學術界不忘初心,緊貼形勢發展,以問題導向加以研究探討,一針見血地指出癥結所在,並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認為,從許多事件的端倪便能察覺澳門社會問題,例如:澳門社會在2009年至2013年期間出現的各種遊行主題越來越多元,其中包含:反貪腐、保民生、削外勞等議題,而且還愈來愈多樣化,背景也涉及不同階層。在此背景下,離補法案被民眾視為官員增加自身離職後的補償,社會產生相對剝奪感。公共行政改革至今的步伐及進度都步入深水區,公共行政改革的難度也逐漸暴露出來。從挑戰性來看:一是面對區域競爭的壓力,澳門政府服務創新、規劃和政府職能皆有待梳理。二是市民日益強烈的各項訴求以及要求行政透明度的意願(政府透明度、財政透明度、施政透明度、資訊透明度)逐步升溫。三是澳門公共行政改革主要在處理社會及民生問題,機構臃腫、制度僵化、效率低下。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的必要邏輯在於,一是回應國家總體規劃,融入國家發展的必然需求;二是引導澳門自身經濟及社會發展需求;三是順應澳門特區政府轉變職能需要。^⑤

學術界也有從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分析,認為特區政府管治能力存在的問題是,政府治理能力總體仍然偏弱、社會治理能力亟須加強、經濟調適能力有待提高、區際協作能力具上升空間、突發災害的應對能力有待增強、電子政府等治理技術需要強化。^⑥此外,更為嚴重的是在歷次社會運動中,民粹主義、福利主義此起彼落,甚至出現了越來越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和排外情緒,本土觀念在這些思潮的影響下得到放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原有社會資本的流失。^⑦

然而,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澳門的發展更多時候是由外力推動的,澳門面臨的困境也無法完全依賴內部動力來解決,必須拓寬視野,在更大的空間和格局上尋找出路。2018年,習近平主席在接見港澳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訪問團時,對港澳特區發展提出了四點希望:一、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二、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三、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四、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這四點希望,是在全面總結港澳過去40年參與國家改革開放過程中的歷史成就和發展經驗的基礎上高度提煉出來的,既為特區未來確立了定位,也指明了特區未來的發展方向。

的確,澳門是在助力國家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發展壯大的,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時拓寬了增長的空間並釋放出潛能,是在參與國家治理實踐中取得了“一國兩制”的成功,也是在促進國際人文交流中找到了自身的定位。20多年來,澳門在政治、經濟、社會諸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走出了一條獨特的道路。然而,在新的歷史階段,隨着國際局勢的變化,因應周邊地區的發展,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多,面對的挑戰也越來越大。這些問題與挑戰,部分是歷史遺留下來的,部分是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還有部分是由澳門自身條件和外部環境造成的,例如:在

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缺乏的情況下,如何推進經濟產業多元化發展?在人際關係密切、相當擁擠的空間裡,如何釐清政商、政社關係的邊界以及理順其間的關係,使政府、市場、社會各司其職?在訴求日益多元和複雜的當今社會,法律、行政如何改革完善和制度創新,以提振政府的威望和特區的整體運作效率?在世界特別是周邊地區快速變化發展的格局中,澳門和澳門居民如何提升競爭力,以避免邊緣化?澳門如何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充分發揮自身的潛力和比較優勢?如何進一步有效加強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並增強其專業能力,使得“一國兩制”偉大事業後繼有人、薪火相傳?促進經濟多元發展,提升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運作效率,推進社會公義公平,增進市民福祉,確保特區長治久安,是澳門未來發展亟需面對的重要問題和挑戰。這些問題和挑戰,僅僅靠社會的內生動力是難以解決的,澳門必須搭乘國家發展的快車,更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全力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在國家新時代發展中尋找自身的發展空間,在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過程中尋找自身改革、自我完善的機會,充分調動社會內部各方的積極性,充分激發各社會領域的活力和創造力,從而進一步拓展格局、釋放潛力、增強信心、施展才能,逐步解決現存的問題,應對新的挑戰,將澳門真正正打造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以及“以中華文化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為“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再創輝煌。

2. 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2013年11月舉行的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並將之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更提出在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到本世紀中葉,“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019年10月,中共第十九屆四中全會要求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健全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完善香港、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內地優勢互補、協同發展機制,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着力解決影響社會穩定和長遠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⑧

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是從泛珠合作到大珠三角都會區的概念逐漸演變而成的。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不僅是從單個城市的角度通過合作實現優勢互補或者解決各自的發展瓶頸問題,而是要從區域經濟發展甚至國家發展大局出發,促進區域協同發展,形成系統整合的整體性效應。^⑨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是港澳突破發展局限和困境的最佳出路。一方面,為港澳全面融入國家發展戰略搭建了平台、鋪陳了路徑,為港澳的未來發展擴大了空間和格局,有利於港澳解決自身的深層次矛盾並充分發揮其潛力,有利於港澳同胞增強民族觀念和國家意識;另一方面,作為中國開放程度和發展水平最高的區域之一,大灣區可以充分利用港澳的特殊優勢,為新時代中國更好地與世界接軌、參與國際競爭、走進世界舞台中央、爭奪國際話語權和國際規則的制定權作出貢獻,成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引領地。

橫琴是澳門參與大灣區建設的第一站,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建議將橫琴定為‘社會管理綜合體制改革試點區’……借鑒前海新區‘法定機構’的管理模式,成立行政化管理和企業化運作相結合的公共管理機構,爭取賦予橫琴新區相當於計劃單列市產業管理許可權和省一級的項目審批許可權。”^⑩2021年9月,中央印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澳門正式參與橫琴的“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深合區成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新平台、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的新空間、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新示範、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新高地。橫琴深度合作區是在

配合國家“十四五”發展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成立的。粵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橫琴深合區，是“一國兩制”實踐的重大突破，是澳門邁向新征程、增加新動能、創造新氣象的重大歷史機遇，是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甚至比 20 年前博彩業適度開放，更能對澳門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習近平主席對港澳發展寄以厚望，強調港澳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組成部分，強國建設離不開港澳的長期繁榮穩定。換言之，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進程中，港澳都有自身的角色，都應該也能夠發揮作用、作出貢獻。而履行此一歷史使命的前提，是確保自身的繁榮穩定。從中央角度，堅定不移地落實“一國兩制”，有求必應地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從特區角度，具體到澳門，我們指出：首先，正確認識和實踐“一國兩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以及國家的憲制權力和憲制機關的權威；其次，落實“愛國者治澳”，完善“一國兩制”的制度和體系，理順政府的職能，建立高效的行政架構和隊伍，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第三，全情投入橫琴深合區建設，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國家發展與民族復興貢獻力量並分享紅利和榮光；第四，促進澳門經濟多元化，加快“一平台、一中心、一基地”建設，優化澳門居民的生活工作空間和條件，提高居民的民生福祉和幸福感，逐步解決社會發展積累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⑪也只有這樣，“一國兩制”的偉大事業才能蓬勃發展，欣欣向榮。

3. 邁向國際大都市

今年五月，中央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來澳門考察調研。他站在國家大局的高度，全面、系統、科學總結了澳門的六大優勢，希望各界齊心協力把澳門國際大都市“金名片”擦得更亮。這不僅提振澳人信心，更是未來發展的發力點。如果諸多優勢得以充分發揮，澳門將進入一個全新的飛躍發展期。

澳門地窄人少，一直被認為是限制發展成為國際大都市的因素。正如有學者在澳門回歸前所言，其發展思路應堅持強而不在大，堅持精而不在多，堅持質而不在量。其目標不在於搞成國際性大都市，同香港平起平坐，搞成“大澳門”，而是要力爭成為有一定國際知名度、有較高經濟效益、有廣泛聯繫渠道的袖珍型國際化城市；不在於追求成為大而全的工業基地，但要適度發展為有競爭力的製造業中心；不需要也沒有條件搞成國際性金融中心，但要使金融業不斷多元化，使其成為優質服務取勝的主導行業之一；不在於擴充成特大型交通運輸樞紐，但要成為一個具立體網絡，有助於自由港優勢充分發揮的港口城市；不宜搞成博彩獨大的賭城，但要發展成為文化內涵豐富、功能多元、特色突出的旅遊目的地。^⑫

平心而論，四分之一世紀前能有此見地，已經殊不簡單。可是，從早期全球貿易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製造業興旺，澳門都充分利用了“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地位優勢，取得飛躍發展。回歸以來，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優勢，創造了澳門經濟發展史的奇跡。這充分證明，只要解放思想，拓展視野，大膽改革開放，小桌子是可以唱大戲的。正如夏寶龍所言，“回歸祖國 25 年來，澳門經濟實現跨越發展，社會保持長期穩定，居民生活持續改善，多元文化交相輝映，城市面貌獨具特色，國際影響力和國際知名度大幅提升，已發展成為國際大都市。”^⑬

然而，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產業單一，一直決定了澳門的興衰。為徹底擺脫這種歷史周期率，保持澳門長期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產業多元化是必然選擇。這是中央的要求，也是澳門社會的共識。經過多年討論，社會也有各種好建議好方案。目前要做的就是下定決心，克服困難，逐項落實，不能流於口號和形式。

任何城市的發展都有自身的局限性,但也有其獨特性,利用得當,可以發展得很好。國際大都市不在於“大”,而在於其全球政治、經濟、文化和科技的影響力。日內瓦只有澳門一半的土地面積和三分之一的人口,卻是名副其實的國際大都市,不僅人均生產總值有 12 萬美元,還有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貿易組織、聯合國歐洲總部等國際機構落戶,國際影響力和知名度都極高。澳門相對其他省市擁有明顯的比較優勢。這些優勢,特別是地位優勢和制度優勢,賦予澳門更大的創新空間和融合能力,使澳門在國家戰略中佔據一個比較有利的位置。特別是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港澳要打造成為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健全港澳在國家對外開放中更好發揮作用的機制,為我們未來的發展打開了空間。

文化及其影響力是國際大都會的重要標誌之一,是澳門最具發揮空間的資源優勢,也是澳門在國家發展戰略中最為重要、最具澳門價值、最能作出貢獻的資本。數百年不間斷的中西交流經歷,不僅奠定澳門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歷史地位,也鑄就了澳門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定位。無論是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還是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服務平台,貫穿其中的都是文化,文化是根本,文化是靈魂。澳門擁有古今同在、中西並舉的深厚歷史文化底蘊,具有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文化交流互鑒豐富經驗,有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良好社會環境,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獨特話語體系。澳門是名副其實的人類文明實驗室,享譽世界,是建設國際大都市的最佳切入點和最有效的路徑選擇。

正如前述,“澳門學”主要倡導者都十分重視文化在澳門發展中的作用。“文化的開發更應置於基礎地位,要盡快建立綜合性的統籌機構加以推動”^④,中外文化交流互鑒是澳門最擅長的,這也是國家所需要的。文化強國,提高軟實力,切入點毫無疑問是文化。這也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義。在百年不遇的世界大變局中,正是澳門大顯身手時,如果將澳門比喻成一個文化符號,無論是西方人還是中國人,都很容易識別、讀懂和接受。如果我們將這個符號做大做強,創造更好的政策條件和營商環境,發揮澳門中西文化薈萃的人文優勢,將澳門建設成為名符其實的中西文化薈萃之地,吸引中外文藝名家、國際文博機構和文博項目來澳門落戶,交流思想,切磋技藝,共同創作,聯合展演,將澳門打造成為中國的文化矽谷^⑤,用西方人能接受的方式、能聽得懂的語言講好中國故事和“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故事,澳門將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張靚麗名片,成為向世界傳播中華文化、中國理念、中國制度和中國價值以及促進中外文明交流互鑒和世界各國人民相互了解的重要基地,也必將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發揮最大的作用。

結 語

回顧澳門回歸前後 25 年的發展軌跡,我們發現,澳門學術發展基本上是圍繞“澳門學”的構建而展開的,澳門學也基本上按照最初倡導者的構思而不斷進步,探索澳門的發展理論、制度和道路。以“澳門學”為旗幟,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滿懷熱情加入到澳門學術發展的隊伍中,不斷完善澳門學的學科建設並拓展視野,開闢新的領域,致力於構建本土知識體系,形成一套反映出澳門獨特性的完整系統的宏觀敘述及解釋體系,確立澳門的學術自主性,鞏固澳門的學術話語權,以及團結、壯大不同學科的青年研究人員,提高學術研究水平,以學術發展不斷促進價值共同體的構建。

令人欣慰的是,澳門學術界一直以“立足澳門,研究澳門社會,為澳門的安定、繁榮和發展服務”為己任,在“結束舊秩序、產生新秩序”過程中用心用情出謀獻策,貢獻智慧和力量。^⑥特別是澳門回歸祖國以來,澳門學術界一直是“愛國愛澳”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一直是澳門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可以依賴和依靠的一支重要隊伍。無論是中央制定涉及澳門的重大政策、重大舉措，還是澳門特區出台的重要法律和政策以及舉辦的重大活動，澳門學術界都始終能團結一致，旗幟鮮明，堅定把握“一國兩制”的正確方向，通過多種途徑及時發聲，有效發揮了輿論的正確引領作用，彰顯了澳門學術界較強的凝聚力和戰鬥力，為澳門牢牢掌握“一國兩制”的話語權，為鞏固和發展同“一國兩制”相適應的社會政治基礎和核心價值作出了重要貢獻。^⑪

“一國兩制”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偉大創舉，是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和豐富。我們相信，澳門又將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期，學術界要輕裝上陣，履行新的使命。學術界要不忘初心，堅定正確的價值導向，時刻牢記“國之大者”，有鮮明的國家立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參與國家治理實踐；同時，解放思想，改變觀念，樹立大視野、大格局和大發展的意識，向國際尋求突破，在國家擴大對外開放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學術界要履行時代的使命，還一定要有強烈的現實關懷，深入社會，深入民間，多做田野研究，出思想，出對策，敢建言，講真話；一定要大團結、大聯合，同時與外地學術界建立更加緊密的聯繫，分工協作，深耕細作，把澳門學術推進一個新的台階，並以此增強居民的民族觀念和國家意識。我們堅信，澳門學術越發展進步，我們的價值共同體也會越鞏固牢靠，澳門“一國兩制”的實踐亦將取得更大的成功。

①參見《建立珠江三角洲經濟區 調查規劃工作部署開展》，澳門：《華僑報》，1983年7月16日。

②參見《暢談澳經濟活動現況及前景 未來發展與南中國關係密切》，澳門：《華僑報》，1984年11月9日。

③參見《對珠海經濟特區發展的幾點看法》，澳門：《華僑報》，1985年10月14日。

④參見《珠海不可能取代澳地位 合作與競爭是發展方向》，澳門：《華僑報》，1986年9月15日。

⑤參見《暢談未來施政方針肯定澳門大有前途》，澳門：《華僑報》，1986年12月18日。

⑥參見《試談第二香港和經濟一體化問題》，澳門：《華僑報》，1989年3月6日。

⑦參見《形勢可迫人水到渠成 社會要發展不能等待》，澳門：《華僑報》，1985年10月20日。

⑧⑨黃漢強（編）：《澳門問題資料匯編2》，澳門：華僑報出版社，1986年，第17~18頁；第17頁。

⑩林達光：《系統完整地研究澳門 為澳門未來發展服務》，澳門：《華僑報》，1988年4月24日。

⑪參見《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 近舉行澳門學研討會》，澳門：《華僑報》，1989年3月9日。

⑫黃漢強：《關於建立“澳門學”的一些思考》，廣州：《港澳經濟》，1989年第2期。

⑬魏美昌：《澳門縱談》，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年，

第153~154頁。

⑭⑮⑯楊允中：《論回歸意識》，澳門：澳門經濟學會，1999年，第291頁；第122頁；第152頁。

⑰陳樹榮：《澳門鹹淡水文化的特徵及發展》，澳門：《濠鏡》，第15期（1997年11月）。

⑱根據澳門《1999年度管理帳目及營業帳目》資料整理。

⑲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二零零零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

⑳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二零零一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

㉑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二零零二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

㉒澳門立法會第一常設委員會第3/III/2006號意見書。

㉓劉羨冰：《澳門人的愛國光榮傳統》，見《澳門2002》，澳門：澳門基金會，2002年，第318頁。

㉔陳守信：《賭權開放——經濟效應及前景展望》，見《澳門2002》，澳門：澳門基金會，2002年，第178頁。

㉕葉建華：《在博彩業開放的路途上》，見《澳門2002》，澳門：澳門基金會，2002年，第195頁。

㉖何啟海：《一業為主、多種產業並存的策略是澳門經濟穩健發展的基礎》，見《澳門2002》，澳門：澳門基

金會,2002年,第232、239頁。

②⑥參見《提升理性思維,提升依法施政權威性——“五一遊行:反思與總結”座談會紀要》,澳門:《澳門研究》,2007年第6期。

②⑦楊允中:《論行政長官與行政長官制(五)》,澳門:《澳門日報》,2014年8月13日。

②⑧史超宇、陳建新:《從理性選擇理論評澳門第七屆立法會直選結果》,澳門:《澳門研究》,2021年第4期。

②⑨袁金淑:《加強青少年愛國愛澳的建議》,澳門:《澳門日報》,2015年5月13日。

③⑩古步毅(Paulo Rego):“選舉年的危機”,澳門:《澳門平台》,2024年7月5日。

③⑪何厚錫:《見證歷史的記錄》,見楊允中《論回歸意識》序言,澳門:澳門經濟學會,1999年,第1頁。

③⑫吳志良:《澳門歷史話語權的回歸》,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3年第2期。

③⑬吳志良:《把握歷史話語權 樹立正確價值觀》,北京:《人民日報》,2019年12月20日。

③⑭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2014年10月15日),見《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133頁。

③⑮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先破後立”——澳門公共行政改革研究》。澳門: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2022年11月,第24~25頁。

③⑯婁勝華:《提升特區政府管治能力研究》,澳門:《行政》,2019年第2期。

③⑰④①吳志良:《洞察變局 探求未來——寫在〈澳門研究〉100期出版之際》,澳門:《澳門研究》,2021年第3期。

③⑱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涉港澳內容,2019年11月。

③⑲毛艷華、榮建欣:《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願景與機制創新》,澳門:《澳門研究》,2018年第1期。

④⑩《多元與融合:大珠三角都會區建設研究》,澳門:澳門基金會,2017年,第149頁。

④⑪夏寶龍:《在澳門中華總商會與企業家代表座談的談話》,澳門:《澳門日報》,2024年5月15日。

④⑫楊允中、柳智毅:《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澳門發展策略》,澳門:澳門經濟學會,2017年。

④⑬吳志良:《創條件打造澳門成文化矽谷》,澳門:《澳門日報》,2024年5月18日。

④⑭林達光:《發刊詞》,澳門:《澳門研究》,1988年創刊號。

④⑮吳志良:《大視野 大格局 大發展》,澳門:《澳門日報》,2024年6月17日。

作者簡介:吳志良,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會長,北京外國語大學名譽教授,博士。

[責任編輯 劉澤生]